

# 魏晋六朝“文义”考辨

陈祥谦<sup>①</sup>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株洲 412008)

**摘要:**盛行于南朝的“文义”,其实是“文”与“义”的联合体,“文”指诗文辞赋,“义”指经典大义,实则是对经典的阐释及对有关经典问题的学术探讨。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多样性和文人士修养的全面化,以及“文义”审美趋向一致,使“文义”并词成为必然,而刘勰则是将“文义”这一当时流行的文化现象纳入其文学批评著作的第一人。

**关键词:**魏晋六朝;文义;义学;考辨

《文心雕龙·序志》赞曰:“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sup>[1]</sup>关于“文义”,历来无具体论述。详察《文心》,仅“义”之用就达 139 处,意义繁多。而“文义”联用有两处:一为上述;一为《章句》之“寻兮字承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无益文义”,不难理解,即言“兮”字无助于诗文章句的实义,“文义”属于偏正词组。但于“咀嚼文义”之“文义”,则难以用上述构词的诠释方法解释清楚。在宗法“五经”以论文的《文心》中,刘勰自始至终视经典为文学的准则,大致不会在结穴之处表现为重文轻义。下面结合中古时风,对“文义”作些粗浅考释。

—

中古时期的史籍文献在言及文人士乃至帝王的好尚与才能时,多有“文”“义”并词现象。如《何充传》“充风韵淹雅,文义见称。”<sup>[2]</sup>卷 77《世说新语·政事》“何骠骑作会稽”条刘孝标注引《晋阳秋》“(何充)思韵淹通,有文义才情。”<sup>[3]</sup>《王羲之传》“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sup>[2]</sup>卷 80《王雅传》引王雅语:“(殷仲堪)以文义著称。”<sup>[2]</sup>卷 83《谢弘微传》称“(谢)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sup>[4]</sup>卷 58《刘义庆传》“(义庆)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sup>[4]</sup>卷 51《庾杲之传》“杲之少而贞立,学涉文义。”<sup>[5]</sup>卷 34 等等。与文人士所好尚的“文义”同时被并词于史籍文献的还有“文史”、“文艺”等,如《宋书·范晔传》“鲁国孔熙先博学有纵横才志,文史星算,无不兼善……(范晔)爱其文艺。”<sup>[4]</sup>卷 69

这些好尚“文义”的传主在“文”一端的表现比较明显,朱自清先生尽管注意到了中古时期有关“文义”的表述,却偏执于“文”一端。他在《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中不无揣测地说:“南朝史书多‘文义之士’的称谓,大概是指作诗的人。……文义与文学意思差不多,不过文义较重文,而文学较重学。”<sup>[6]</sup>136 方笑一在《论东晋永和文学》一文中大抵是套用了朱先生的说法:“‘文义’一词,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谓‘文学’。”<sup>[7]</sup>这一说法明显忽视了“文义之士”好尚的另一端,即“义”。“义”是其才能、修养的重要方面,如《文明王皇后传》“后年八岁,诵《诗》《论》,尤善《丧服》。苟有文义,目所一见,必贯于心。”<sup>[2]</sup>卷 31《杜京产传》“(京产)颇涉文义,专修黄老。”“学遍玄儒,博通史子,流连文艺,沈吟道奥。”<sup>[5]</sup>卷 54 可见,“义”涵盖较广,并非只是附丽于“文”而无有所指。

“文义”早在东汉时期撰著的史籍文献中就有联用,“文学”、“儒学”并提。《汉书·儒林传》:“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并以“文章尔雅,训辞深厚的文学、儒学之士为官,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sup>[8]</sup>卷 88 同书卷九《元帝纪》引班固外祖兄弟语:“元帝多材艺,善史书。……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元帝先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其为太子时曾建议“宜用儒生”而受宣帝批评:“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sup>[8]</sup>可知,“孝宣之业衰”乃元帝受“文义”牵制的缘故,即征用文学儒者,“纯任德教、用周政”。此所谓“文义”,或是文儒之士,或是文治儒术。又《韦贤传附子韦玄成传》有“古之辞让,必有文义可观,故能垂荣于后”,

① 收稿日期: 2007-09-25

作者简介: 陈祥谦,男,湖南益阳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文艺学硕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方面的研究。

韦贤是“兼能《礼》《尚书》,以《诗》教授”的“邹鲁大儒”,韦玄成“少好学,修父业,……以明经擢为谏大夫”。<sup>[8]卷7</sup>不难看出,“文义”并指文学、儒学。《杨雄传》载,桓谭将杨雄之书比作儒家经典,称其“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sup>[8]卷8下</sup>要之,此一时期的“义”大体只与儒学思想、儒家经典有关。

刘师培先生深得“文义”之别,他在《宋齐梁陈文学概略》中说:“考之史籍,则宋文帝时,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别立文学馆,使司徒参军谢元掌之。明帝立总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此均文学别于众学之征也。故《南史》各传,恒以文史、文义并词,而文章志诸书,亦以当时为最盛。”<sup>[9]66</sup>其意思是“文史”、“文义”并词,即证明文学已获得与“史”“义”同等地位,而文学又有别于“史”“义”诸学。以史料验之,此说甚是。《孔琳之传》:“(琳之)好文义,解音律,能弹棋,妙善草隶。”<sup>[4]卷56</sup>首先,“文义”是有别于“音律”、“弹棋”、“草隶”的;其次,它们虽是并词联用,但都有两项不同的内容。又《朱异传》云:“(异)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年二十,诣都,尚书令沈约面试之,因戏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达其旨。约乃曰:‘天下唯有文义棋书,卿一时将去,可谓不廉也。’”<sup>[10]卷38</sup>如果将沈约所谓“文义棋书”来映对朱异所长,“义”应是对《五经》一类经典的研究,朝廷并为之设有“义学士”,如“梁简文在东宫,雅爱经术,引(郑)灼为西省义学士。”<sup>[11]卷71</sup>汉魏以后,本为儒家经典的《易》却成了玄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文义之士”在“义”一端也多有突出表现,如上文提到的殷仲堪能清言,喜读《道德论》,其谈理与韩康伯齐名;何充“性好释典”等等。无疑,“义”已涵盖儒释道。

“文义”的并词联用,首先在于“义”有其特定内涵,而“文”与“史”“义”又有着同等重要的学术地位和社会价值。若按刘宋比较成熟的“四学”分科来框定“文义”,则可以说:“文”所对应的是“文学”,它侧重于诗文书赋的创作与批评;“义”所对应的则是“儒学”(涉及释道),其内涵因玄学的兴盛和佛教的流布较汉代逐步扩大,对经典进行主体性阐释和研讨是其旨归。

## 二

“义”原本是和仁、忠、信等同被儒家宣扬的道德概念之一,作为一种至高品质和德操,为东汉士人所标举,与“名”并成为他们的最高价值取向,即极力表现出对“义”的追求和以争利为耻。《后汉书·刘般传》载,刘恺“当袭般爵,让与弟宪,遁逃避封……肃宗美其义”。<sup>[12]卷39</sup>汉儒对“义”的诠释是:“义者,宜也。……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sup>[8]卷58</sup>(《公孙弘传》)“义”这类道德概念为社会提供了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判断是非的标准,世人或“训之义方”,<sup>[12]卷68</sup>(《郭太传》)或“示以义方”,<sup>[12]卷66</sup>(《张奂传》)而且,袁宏所谓“名教”也就成了“义教”。<sup>[13]</sup>(《后汉

纪·序》)对“义”的崇尚也就进一步转化为士人对包孕了这些传统核心思想且文简字质、旨意玄微的儒家经典大义的主体性把握,这种熔铸主体意识具有鲜明反思色彩的经典阐释逐渐成为时代潮流,即“义学”。陆贾《新语·道基》云:“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sup>[14]</sup>《儒林传·召驯传》:“驯小习《韩诗》,博通书传,以志义闻,……帝嘉其义学。”<sup>[12]卷79下</sup>同卷《杨仁传》载:“其有通明经术者,显之右署,或贡之朝,由是义学大兴。”东汉郑玄以《毛诗笺》开后世义疏之先河<sup>[15]</sup>(参阅焦循《孟子正义·孟子题辞疏》),于是,义疏之学打破了汉儒繁琐注经、缜纬风行的格局,在魏晋玄风的鼓荡下,尤其是南朝,蔚为大观。

《晋书·郭象传》载:“向秀于旧注外而为(《庄子》)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sup>[2]卷50</sup>对这桩学术公案是非姑置勿论,仅从曾被东汉士人视作行为准则的“义”在形而上的探索一端来考察,它已将主流思想与经典要义融为一体,并呈现开放包容的状态。孔颖达则站在儒家立场批评江左义疏:“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sup>[16]</sup>(《周易正义序》)这里的“住”、“空”、“能”、“所”为佛教之说;<sup>[17]525</sup>说明这个时期的义学已不固守儒典。而且,治经者又弃别注经传统,“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sup>[12]卷74</sup>突出自我对经典要义的把握。“义”在此层面上发生了学术内容和形态的变化。

《隋书·经籍志一》<sup>[18]</sup>经部著录表明,自魏晋以降,尤其是南朝,经学研究著作多以“义”、“大义”、“义疏”冠名。《张讥传》所载很能说明这一现象,张讥“撰《周易义》三十卷,《尚书义》十五卷,《毛诗义》二十卷,《孝经义》八卷,《论语义》二十卷,《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外篇义》二十卷,《杂篇义》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sup>[11]卷71</sup>由于“义”是对经典的研究,业已以著述方式文化并递相传承,其借助“文”的性质有所显现,故而能如“史”一样,与“文”并称之。尽管“义”在重“义理”的玄风鼓荡之下经由道德概念渐变而为对经典的学术性研究,但其表现形式和内涵仍决定于研究对象,与“文”的区别较明显。因此,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文义”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谓“文学”。

## 三

相对于上述以著述为主的“义疏”,还有本于经典的“讲经”、“述义”,从字面含义即可知与讲解、谈论经典有关。如《严植之传》载:“植之讲,五馆生必至,听者千余人。”<sup>[10]卷48</sup>又《张正见传》云:“梁简文雅尚学业,每自升座

说经,正见尝预讲筵,请决疑义,吐纳和顺,进退详雅,四座咸属目焉。”<sup>[19]卷34</sup>南朝之所以盛行对经典的讲述,与其时以“文义”取仕的时风有着极大的关系,这恐怕也是义学得以昌盛的主要原因。《南史·齐宗室始安王遥光传》:“太子不悦学,唯漫游是好,朝议令蔡仲熊为太子讲《礼》,未半,遥光从容曰:‘文义之事,此是士大夫以为伎艺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讲为?’上以为然,乃停讲。”<sup>[11]</sup>萧遥光所谓“文义之事”当然包括“文”与“义”两端,而“伎艺”所突出的则是文学的创作和对经典的义疏。又《梁书·武帝纪中》引《武帝诏》:“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sup>[10]</sup>余嘉锡先生说:“‘通’谓解说其义理,使之通畅也。晋、宋人于讲经谈理了无滞义者,并谓之通。”<sup>[3]231</sup>其后世亦如之,梁武帝定“通经”为取仕标准,无疑强化了以“义”取仕之风。

“讲经”、“述义”既促进了南朝“义学”的繁荣,也确实成就了讲述者的仕途。如贺瑒、孔子祛、朱异、贺琛、皇侃、贺蒨等,都是“精力专门、尽通其业”的讲述经典大义的行家,“于学讲说,听者数百人”。<sup>[10]卷48</sup>姚察在《儒林传论》中称他们“遭梁之崇儒重道,咸至高官”。<sup>[10]卷48</sup>善解旨意,甚或比附经典者,亦能得到赏识,如《南齐书·褚炫传》记载,褚炫因善于比附经典而得到宋明帝擢拔,“入殿侍文义”;这当然还有文学、口才等因素。南朝时期,学士文人以开坛讲说为形式,以经典为讲说之资,或是绍魏晋清谈之余绪。所谓“清谈”,一般是指学士文人以探讨有关《周易》《老子》《庄子》的玄学问题以及儒学等其它方面的学术问题为基本内容,以讲究修辞和技巧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谈讲和论辩。<sup>[20]67</sup> P84如《臧袞传》“简文在东宫,召袞讲论。又尝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学互相质难,次令中庶子徐骠骑骋大义,间以剧谈。摛辞辩从横,难以答抗,诸儒慑气。时袞说朝聘义,摛与往复,袞精采自若,领答如流,简文深加叹赏。”<sup>[11]卷71</sup>《陈书·马枢传》:梁邵陵王“纶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王欲极观优劣,乃谓众曰:‘与马学士论义,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于是数家学者各起问端,枢乃依次剖判,开其宗旨,然后枝分流别,转变无穷,论者拱默听受而已。”<sup>[19]卷19</sup>

此一时期的开坛聚讲,多以“义”为辨析核心和讲谈对象,“义”实际是学者们对经典的研讨所形成的思想观念。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八“六朝清谈之习”条中所言:“至梁武帝始崇尚经学,儒术由之稍振,然谈义之习已成,所谓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辩之资。……是当时虽从事于经义,亦皆口耳之学,开堂升座,以才辨相争胜,与晋人清谈无异,特所谈者不同耳。”<sup>[21]</sup>可见,“讲经”、“述义”的重点还是在经学。

## 四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晋宋以来的士人们的政治热情

明显不如建安文人那样心系天下、渴望建功立业,而是将目光进一步内敛,关注于个体的情感世界,独任怀抱,放眼于社会人情之外,“爱好文义,不以人俗累怀”。<sup>[4]卷93</sup>因此,与前人相比,这一时期的学士文人更显得优游从容。“士人并以文义为业”,<sup>[4]卷76</sup>或“专以谈义自业”;<sup>[5]卷24</sup>而且,“义”是以聚谈、赏会、附庸风雅等面目作为“闲业”出现的,《南齐书·陆澄传》“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sup>[5]卷39</sup>《资治通鉴》进而解释:“自宋世祖好文,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专经为业者。”<sup>[22]卷136</sup>虽不免夸张,但确为风尚。他们在悠闲适意的氛围中赋诗谈义,越来越注重言辞的雕绩和求异追新的格调。

“义”讲究藻饰,与作文的路数基本一致。《谢朗传》云:“朗善言玄理,文义艳发。”<sup>[2]卷79</sup>又《左贵嫔传》:左芬“少好学,善缀文……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左右侍听,莫不称美。”<sup>[2]卷31</sup>《世说新语·文学》中记录的所谓“叙致精丽,才藻奇拔”,“才藻新奇,花烂映发”云云,都是称赞讲谈者言辞的华美。这就使得听者在欣赏其精义辩才的同时,也能从其华丽的藻饰中获得如同赏读“宏丽精华”之文的满足。《世说新语·文学》对这类审美满足感的描述颇多,如“四坐莫不厌心”、“众人莫不抃舞”、“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等等;甚至阐发的高妙义理有时竟被艳丽华美的言辞所掩盖,听者“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sup>[3]</sup>义疏“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讲之路”。<sup>[16]</sup>《尚书正义序》从藻饰这个层面来看,“文义”的兼善尽美成了士人的共同追求,如“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sup>[4]卷73</sup>《颜延之传》)

在“文变染乎世情”<sup>[1]</sup>《时序》的时势下,文学必然会推陈出新;正如《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传论》所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义学的新变则是从这个时期儒生讲说经义“不本先儒之旨”<sup>[23]卷81</sup>开始的,史称“师训盖寡”,<sup>[23]卷81</sup>即讲学务求新颖,喜立异,又多诡辩。《周易正义序》云:“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sup>[16]</sup>《尚书正义序》认为,义疏者“织综经文,穿凿孔穴。诡其新见,异彼前儒。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甚至“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sup>[16]</sup>等等。可见,文学、义学在对新变的取向上不尽相似,其内涵也不相同。

“文义赏会”、“文章谈义”促成了“文义”的相容。《宋书·袁顼传》曰:“(顼)唯赋诗谈义而已。”<sup>[4]卷84</sup>《南齐书·刘绘传》云:“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王西邸。”<sup>[5]卷48</sup>以文义冠世的王羲之、谢安、支遁等人“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sup>[2]卷79</sup>《谢安传》“言咏属文”即包含着创作诗文与谈论义理两个方面的内容,或以“义”入诗文,或借助诗谈义。他们在兰亭的聚会、庐山石门的聚会都是“文章谈义”。《谢灵运传》谓博通儒学的谢灵运“文章之美,江左莫逮”,而朝廷仅以御用文人待之,“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sup>[4]卷67</sup>又《何尚之传》“尚之)雅好文义,从容赏会,甚为文帝所知”;而

且,他“爱尚文义,老而不休,与太常颜延之论议往反,传于世”。<sup>[4]</sup>卷66“传于世”是指他们有论议“文义”的文字作品流传。他们的子辈何偃与颜峻也“以文义赏会,要得甚欢”。<sup>[4]</sup>卷59(《何偃传》)这类以“文义”为探讨主题的书信文章,多被纳入他们的文集,而且其中一部分被当作文学的范本广为流传,如刘孝标的《重答刘秣陵沼书》、《辩命论》等就被收入昭明太子所编的《文选》。因此,“文义”的融会,很难说“是玄学或清谈影响文学的具体表现”。<sup>[24]</sup>中古时期,尤其是南朝儒学的复兴和文人学士修养的全面化,以及“文义”的交互影响,“文义”并词流行成为必然。

总而言之,盛行于南朝的“文义”,其实是两个完全的独立体。“义”从起初儒家所宣扬的道德概念进而成为东汉士人所标举的至上德操,从儒家经典要义的主体性学术阐释到融会释道思想的精义,以至成为文义赏会的内容,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和中古文学的自觉、文学的新变和文学创作的繁荣的轨迹重叠,因此,在儒学尚未完全复兴、正统化之前,“文”与“义”的联合并未即刻离析。“文义”的流行作为一个显著的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但随着儒学学术的正统化,“文义”最终分离。正如前人所言,孔颖达撰定诸经之疏,号曰《正义》;自是以来,著为定论,凡不本于《正义》者,谓之异端。<sup>[25]</sup>(《经义考》卷14引王祐说)义学遂窄变为经典教条,这对中国思想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文”在脱离“义”之后,进一步地纯粹化,无疑,这一分化对古代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更为重要和深刻。

在六朝文化背景之下,我们不难对刘勰所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作出较为理性的理解。刘勰以“原道”“征圣”“宗经”等为“文之枢纽”,即深明“文”与经义的关系,因为“文能宗经,则体有六义”,<sup>[1]</sup>(《宗经》)并且《文心》之作“体乎经”;<sup>[1]</sup>(《序志》)那么,他愿意“傲岸泉石”,要反复体会的这个“文义”,仍当是“文”与经义。如此,刘勰则是将“文义”这一流行于六朝的文化现象纳入其文学批评著作的第一人。

#### 参考文献:

[1]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 [2] 房玄龄. 晋书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 [3] 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4] 沈约. 宋书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 [5] 萧子显. 南齐书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2
- [6] 朱自清. 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 [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 [7] 方笑一. 论东晋永和文学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99 (1).
- [8] 班固. 汉书 [M].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 [9] 刘师培.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10] 姚思廉. 梁书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3
- [11] 李延寿. 南史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5
- [12] 范曄. 后汉书 [M]. 北京:中华书局, 1965
- [13] 袁宏. 后汉纪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4] 陆贾. 新语校注 [M]. 王利器, 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 [15] 焦循. 孟子正义(《诸子集成》本) [M]. 上海:上海书店影印世界书局本, 1986
- [16] 孔颖达. 十三经注疏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 [17] 张岂之. 中国思想史 [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9
- [18] 令狐德棻, 长孙无忌, 魏征, 等. 隋书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3
- [19] 姚思廉. 陈书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2
- [20] 范子烨. 中古文人生活研究 [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
- [21] 赵翼. 廿二史札记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 [22] 司马光. 资治通鉴 [M]. 北京:中华书局, 1956
- [23] 李延寿. 北史 [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 [24] 赵树功. 魏晋六朝“文义”考释 [J]. 文学遗产, 2005 (6).
- [25] 朱彝尊. 经义考 [M].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1998

(责任编辑:黄声波)